



吴家驹 著

宋元古籍丛书 明代古籍丛书 清代古籍丛书 民国古籍丛书
台湾部分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古籍丛书发展史

家驹题

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

古籍丛书发展史
吴家驹

吴家驹
著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籍丛书发展史 / 吴家驹著. -- 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5651-0291-2/G · 1538

I. ①古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古籍—丛书—图书史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2403 号

书 名	古籍丛书发展史
作 者	吴家驹
责任编辑	王欲祥 向 磊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21.5
字 数	290 千
版 次	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 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0291-2/G · 1538
定 价	48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序 言

我认识家驹先生已有二十多年了。八十年代初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,经常需要查阅一些旧版古籍,就到图书馆的古籍部去。古籍部外面的阅览区域并不大,里面书库的堂奥却很深,并向外散发出一阵阵的书香。古籍部里有两位温文尔雅、笑容可掬的图书馆员,一位年长一位年轻,那位年轻的图书馆员,就是家驹先生。每当我提出要找某一部古书时,家驹或是不假思索,直接到书库里把书取出来;或是熟练地翻检厚厚的三大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,很快就查到线索。大凡重要的古籍,他好像都可以从某一套或几套丛书中找出来。偶尔也有南师大图书馆没有收藏的,家驹就会告诉我,这部书收在某某丛中,而某某丛书在南京大学或是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部是有收藏的,可以去那里看看。那时候就觉得这位图书馆员很专业,而且服务态度很好。

后来我到图书馆工作,跟家驹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,了解到家驹先生不仅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图书馆员,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,多年来,在勤勤恳恳做好图书馆古籍部各项业务工作的同时,还挤出业余时间,潜心于典籍,进行学术研究,在海内外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。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古籍丛书发展史》,就是家驹先生的又一部新著。

中国是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源地,且自古人文荟萃、学术昌盛,久为书籍出版大国。十八世纪之前,世界上的书籍,泰半出自中国。自

文人雅士、学者官吏，到僧尼道士、农医工商，皆有著述。作者层出，篇什汗漫，本不易于保存传播，于是有丛书之编。或杂编群书，或以类相聚，要使独本孤篇汇聚为整体，零珍散珠贯穿为彩链，俾作者孤心不致湮没废坠，读者收藏便于保管翻检，于古籍文献的保存与传播，功莫大焉。然自宋代以降，丛书层出不穷，蔚为大观，且种类繁多，体制不一，对一般读者来说，很难得其门径。

家驹著《古籍丛书发展史》，辨析丛书的性质与功能，细述古籍丛书源流发展，详论古往今来重要古籍丛书的内容和特色，并且介绍了古籍丛书的使用方法，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古籍丛书的学术著作。该书内容翔实，资料完备，自成理论系统。所论古籍丛书，上溯宋元，下迄当代，旁及海外，且包括了古籍丛书数字化的新鲜内容。这不仅是古籍研究和图书出版史领域的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，对一般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而言，也是了解古籍丛书的一部极好的参考指南。

家驹书成以示余，并嘱作序。余先睹为快，欣然命笔。

是为序。

徐克谦

2009年4月

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孔子学院

绪 论

第一节 古籍丛书的概念

丛书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体例编纂的著作集,在保存与传播文献典籍、提供与利用信息资源方面,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“丛书”的“丛”字,古代写作“叢”,东汉许慎《说文》:“叢,聚也。从艸,取声。”“丛”的原始意义是聚集,引申为密集生长的草木和集中在一起的人或物。“丛”字还有另一层含意,那就是众多、繁杂,引申为细碎。如《尚书·益稷》中云:“元首丛脞哉。”《书传》解释说:“丛脞,细碎也。”^①

“丛”与“书”两字合用,始见于唐代韩愈的诗歌《剥啄行》:“剥剥啄啄,有客至门。我不出应,客去而嗔……空堂幽幽,有秸有莞。门以两版,丛书于间。”^②这首诗反映了作者贬官之后,闭门谢客,以远谗避谤的心境。“门以”两句,是说用两块木板作门,屋内堆满了书籍,意思是闭门不出,藏书其间,读书自娱。这里的“丛书”是一个动宾词

① [宋]苏轼:《书传》卷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,第54册,第515页。

② [唐]韩愈:《韩昌黎全集》卷四《剥啄行》,中国书店1991年版,第64页。

组,指聚集图书,与后来编纂形式之一意义上的“丛书”,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

首次将“丛书”两字用于书名的是晚唐陆龟蒙的《笠泽丛书》。陆在书前小序中说:“丛书者,丛脞之书也。丛脞犹细碎也,细而不遗大,可知其所容矣……歌、诗、颂、赋、铭、记、传、序,往往杂发,不类不次,混而载之,得称为‘丛书’。”^①可见,这是一部诗文集。以“丛书”命名,取其内容细碎、琐杂之意,实乃著者的谦逊说法。继陆龟蒙之后,宋代王楙有《野客丛书》,其内容是“随意而书”,“不暇詮次”,“稽考不无疏卤,议论不无狂僭”^②的笔记体考证文字,《四库全书》收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,也不是指后来意义上汇集群书的编纂形式。清朱记荣归纳说:“尝考之书以‘丛’名,其义有二,一曰丛积,不名一类……一曰丛脞,犹言细碎也。”^③上面所提到的两部书,皆取丛脞、细碎之意。

那么,什么是文献学意义上的丛书呢?古今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认识,如清王鸣盛说:“取前人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,汇刻为丛书,其在宋则石庐龚士高有《五子合刻》、鄮山左圭禹锡有《百川学海》。”^④

清钱大昕说:“荟萃古人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,始于左禹锡《百川学海》。”^⑤

清末缪荃孙说:“至取各书之全者,并序跋不遗,前人以左圭《百川学海》为丛书之祖。”^⑥

① 《笠泽丛书》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,第1083册,第231页。

② [清]王楙:《野客丛书·小序》,中华书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第304册,第1页。

③ 《槐庐丛书·序》,清光绪中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刻本。

④ [清]王鸣盛:《蛾术编》卷十四《合刻丛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1150册,第163页。

⑤ [清]钱大昕: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1439册,第42页。

⑥ 《儒学警悟·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》,中华书局2000年版。

近人叶德辉说：“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，诚为便于购求之事。宋人《儒学警悟》、《百川学海》二者，为丛书之滥觞。”^①

刘承干则说：“杂取古今人所著汇为一部，而标立名目，号为丛书，始于宋左禹锡《百川学海》。”^②

上述解释，或强调古人著述，或强调内容之零星者，或强调序跋不遗，或强调并括四部之书，且多以宋人左圭所辑《百川学海》为鼻祖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看来，一部书在辑集多种著作时，还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，即所收书细碎芜杂，其子目涉及四部分类法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两个类以上，全书首尾完整，序跋不遗，具有总聚与胥杂的性质，这样的书方能称之为丛书。

按照这种理论，那些门类单一，或首尾有缺、序跋不全的汇编图书岂不都排除在丛书之外了？这一认识似乎过分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它的主体特征，于是，有人给予丛书较为宽泛的解释，如清李调元称，丛书是“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一总名者”，就没有提内容胥杂与跨类辑集的要求。他还说，《隋志》所载《地理书》、《地记》，“是为丛书之祖”^③。这就将丛书起始的时间，向前推进了数百年；将丛书的类型，由综合性丛书延伸到了专门类丛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二三《杂家类》采纳了李调元的这段原话，表明四库馆臣对这一观点的重视与认同。

丛书的现代诠释又是如何的呢？

汪辟疆说：“总聚众说而为书者，谓之丛说；总聚众书而为书者，谓之丛书。”^④

上海图书馆编辑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中说：“丛书是汇集许多种重

① 叶德辉：《书林清话》卷八《丛书之刻始于宋人》，中华书局 1999 年版，第 221 页。

② 《岱南阁丛书·刘承干序》，1924 年上海博古斋景印本。

③ [清]李调元：《童山文集》卷三《〈函海〉后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 1456 册，第 510 页。

④ 汪辟疆：《目录学研究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02 页。

要著作,依一定的原则、体例编辑的书。”^①

《辞海》给丛书下的定义是:“編集多种单独的著作为一编并冠以总书名的出版物。有综合性(汇编)与专门性(类编)之分。”(2010年版)

据上,我们可以归纳出丛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:一是要汇聚群书,至少两种以上(包括两种),多则千百种不限,而不论所收子目在分类上是否跨部越类,在内容上是否芜杂细碎。二是要另题一个总括全书的书名,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著作物。如果没有一个统括全书的总名,即使一部书收了许多人的著作,仍然不能视为丛书。如《曝书亭集》,除收有清朱彝尊的诗文外,还附有其子朱昆田的《笛渔小稿》10卷,但这部书只能归入清别集类,因为它是以朱彝尊的著作为题名的。

丛书特定的含义决定了它与其他文献类型的区别。

第一,丛书不同于类书。

类书是我国古代图书编纂的又一种重要形式,产生的年代很早,一般认为,三国时王象、刘劭等奉魏文帝曹丕之命编纂的《皇览》,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类书。与丛书一样,类书以古代的文献典籍为辑集的对象,因此很容易与丛书混淆。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,这种区别表现在:

内容上,类书是把众多文献典籍中的原始材料按照一定的标准裁剪摘取,而非收录全本;而丛书即便卷帙再小,也必须收录两种以上的单书,且每种单书必须有独立的书名和完整的内容,偶有删节,也不像类书那样零碎。

编排上,类书或随类相从(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),或依字韵排列(如《佩文韵府》)。丛书虽然也按类编排,但都是以一种书为单位,不像类书,将一种书分割成许多零碎的部分,分属于各个类目之下。

编纂目的上,类书是专供人们查检和引用的,属于资料性质。古

^① 《中国丛书综录·前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代的统治阶层用它来考事征引,临事取给;文人学者储以待用,以备撰文赋诗之需;士子们则用作科考之助。因此,类书是古代的工具书而不是专著。这一特征,决定了类书只是辑录现存的文献,并不经过编纂者的考辨阐述,“述而不作”,是其特点。丛书则不然,丛书汇集群书,广罗善本,或加批校,或加考证,辑集各种著述,提供人们阅读与研究,是著作之汇编而不是作为学习与撰述时的工具使用的。

第二,丛书不同于总集。

总集是我国传统图书分类中的一种,指多人诗文的综合集,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、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《文选》,为总集编纂之始。总集的编辑形式大致分为两类,一类网罗宏富,偏重于文献保存,如《全唐诗》、《明文海》,以全为其宗旨;一类选英集萃,意在推荐佳作,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观止》,以精为其特色。总集不同于丛书之处在于,它所辑辑的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书籍,而只是相关的诗文,包括许多零星的作品,即使有一部分保留了原作的集名,往往亦非著作全貌。但由于古代的书目大多不列丛书类,因此,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诗文合编,旧时基本上都归入集部总集类,如清乾隆朝编纂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即作如是安排。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依据其分类原则,将其中辑集各家独立著作、以汇刊形式出现的归入丛书,辑集各家诗文篇章、以重编形式出现的归入总集,与古代书目处理上不同,是比较科学的。如明张溥的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,收有《蔡中郎集》、《魏文帝集》、《陆平原集》等103家,这些集子原本都独立成书,只是通过汇刊的形式辑集在了一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归入集部总集类,而按照现代理念,就应该归入丛书之中了。

第三,丛书不同于别集。

别集又称诗集、文集、文稿、诗文集,是与总集相对而言的,指收录个人诗文的著作。其名称最早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《七录》,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,皆列有别集一目。别集很容易与个人丛书混同。按照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的分类标准,两者的区别在于:别集只收个人的

诗文,属文学类的作品集,如陆游的《剑南诗稿》、《渭南文稿》;而个人丛书则跨部类收录一个人多种单独成立的著作,内容涉及多个学科,不以文学作品为限,如《陆放翁全集》,除收有陆游的诗文集外,还收有《南唐书》、《家世旧闻》等史部著作,因此就不能再作为别集看待了。但也有些古代书目,并不将这种个人全集作丛书处理,而悉数归入集部别集类,此类情况另当别论。别集中还常有附录他人诗文的,如明代顾端辑集的《华阳集》3卷,收录其远祖唐代著名诗人顾况的诗文,卷末附顾况之子非熊诗作18首,题《华阳集子非熊诗附》。这种带有附录的集子分类上仍入别集类,并不因为收录了多人著作而归之为丛书。

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交代,是为了避免在下面的叙述中发生理解上的歧义。

丛书的别称很多,丛刊、丛编、丛刻、丛抄、丛著、丛稿、汇刊、汇刻、汇编、汇抄、汇函、合刊、合编、合刻、合抄、合帙、合集、全编、全书、集览、遗书等,均可以指代丛书。但一部书是不是丛书,不能光看题名,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内容和体例。如近现代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期刊,往往冠以“丛刊”之名,但它与古代意义上的丛刊并非同一概念。

第二节 古籍丛书的起源

丛书的历史悠久,而关于它的起源,众说纷纭,归纳起来,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:

先秦说

一些学者认为,丛书产生的年代很早,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,如姚名达云:“《诗》、《书》者,上古之丛书也。”^①汪辟疆说得更加具

① 姚名达:《中国目录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,第396页。

体：“丛书之制，在周汉已开。乐正四述，《诗》存三经，《书》有六体之殊，《易》有《十翼》之作，丛书之源，远肇于此。”^①但汪辟疆的这段引证存在一个问题，因为这里的“三经”，是指《诗经》中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种不同的诗歌类型；“六体”，是指《尚书》中“典”、“谟”、“训”、“诰”、“誓”、“命”六种体裁的文字；《十翼》，是指《易经》中《上象》、《下象》、《上象》、《下象》、《上系》、《下系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、《序卦》十篇解释《易》的文章。显然，这些都不是独自成立的图书，它们之间的辑集只是诗篇或文章的汇总，而不是著作之合编。可见，这是在丛书概念的理解上产生了歧义。

程千帆则认为，“丛书是按照一定的原则，采用相同的物质形式，把一些著作汇刊在一起的系列书籍。早在战国时代，人们就已经按照一定的原则把一些书组织在一起了。譬如儒家学派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总称之为六艺或六经……如果单从这一点讲，六艺或六经就是我国最早的丛书”^②。大家知道，“六经”是古人对孔子删订的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六部经典著作的总称，孔子曾用它们来教育学生。但孔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还处在我国书籍发展的简帛时期，图书主要抄写在竹简、木牍上，制作工艺落后，体积庞大，携带十分不便，因此，当时的图书往往以单篇的形式流传，如《史记》所载秦王看到的《韩非子》，只是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两个篇章，而要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部著作汇集在一起制作成体式统一的一套大型丛书，在当时还是相当困难的。况且，所谓的“六经”，是汉以后对儒家六部经典的总称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，还不可能将“六经”用来作为书名。

汉代说

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，丛书起源于汉代石经，如近人罗振玉说：

① 汪辟疆：《目录学研究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02 页。

② 《程千帆全集》第三卷《校讎广义·目录编·丛书目录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，第 138 页。

“客有问予丛书所自昉者，予应之曰：丛书尚矣。勒石之世，已有丛书……及汉季立石鸿都门，乃会诸经合刊之，厥后而魏而唐，十二经备焉。释氏经论初也各自为书也，隋僧静琬聚诸经论勒石房山，至辽始尽一藏，其石至今尚存。鸿都石经，房山佛藏，谓之非丛书得乎哉？是勒石之世已有丛书之明证也。”^①鸿都石经即东汉的熹平石经。据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记载，蔡邕“以经籍去圣久远，文字多谬，俗儒穿凿，疑误后学”，于东汉熹平四年（175年）上奏朝廷，请求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，立于太学门外，作为士子学习的范本。此奏经汉灵帝批准，于是开雕刻石，历时八载，至光和六年（183年），刻成《鲁诗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论语》等七部著作，成为我国最早的儒家官定经本。石经始立时，观看与摹写者络绎不绝，每天前往的车乘达千余辆，填塞巷陌，而当时纠缠不清的古今文之争，因有了石经规范的文本而得以止息。东汉以后，三国、唐、五代、宋，历朝迭有石刻经文之举，论书史者认为它是书籍的一种形式，而从汇集群书这一点上看，它也确实符合丛书的基本特征，只不过它的物质载体是石碑而不是纸张，因此，人们多不把它当作丛书看待。

姚名达先生还有另一种理论：“纵使不敢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为丛书之说，岂《汉志》所载《刘向所序》六十七篇、《扬雄所序》三十篇，亦不敢认为个人自著丛书之始乎？”^②民国间执教东南大学的顾实先生认为：“称曰所序者，盖犹今之丛书也。”^③《汉志·刘向所序》条下，列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世说》、《列女传颂图》四种；《扬雄所序》条下，列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、《乐》、《箴》四种，由此看来，视之为个人丛书，似未尝不可。但仍存困惑，理由是《汉志》以后的书目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只列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扬子太玄经》、《扬子法言》等单本著作，未见著录有“刘向所序”、“扬雄所序”等所谓的丛书条。是该

① 《适园丛书·罗振玉序》，民国间乌程张氏刊本。

② 姚名达：《中国目录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，第398页。

③ 顾实：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，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，第113页。

“丛书”至隋代已经散佚，抑或原本就没有所谓的丛书，而只是班固编写《汉书·艺文志》时为了著录的方便，临时将刘向、扬雄的著述集中在一起暂拟的标题？看来，这只能是一个历史的疑问了。

齐梁说

我国在汉代就发明了造纸术，但发明之初，生产的纸张质地粗劣，产量有限，使用并不普遍。后来虽然纸的质量有了提高，但由于人们长期的习惯，还不能很快适应用纸来书写文字。直到东晋桓玄称帝后，下令以纸代简，简帛时代才宣告结束，书籍进入了纸写本时期。南北朝时，雕版印刷尚未出现，但手工抄书已成为一时风尚，出现了一些手工抄写的汇编书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南朝时齐人陆澄汇抄自《山海经》以来 160 种地理方面的著作，取名《地理志》；梁人任昉又续增 84 家，取名《地记》。于是，清代有学者认为，齐梁时产生的这两部书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丛书。如清李调元说：“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一总名者，惟《隋志》载《地理书》一百四十九卷目录一卷。注曰：陆澄合《山海经》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。澄本之外，其旧书并多零失，见存别部自行者，惟四十二家。又载《地记》二百五十二卷。注曰：梁任昉增陆澄之书以为此记，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，见存别部行者，惟十二家，是为丛书之祖，然犹一家言也。”^①但《隋志》记载的这两部汇抄书，今天都已失传。

五代说

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之后，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。但印刷术发明的初期，主要用来刻印历书、佛经、字书以及个人的诗文集之类，部头一般不大，这一状况直到五代时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据《五代会要》记载：“后唐长兴三年二月，中书门下奏：请依《石经》文字，刻《九经》印板，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，将西京石经本，各以所业

^① [清]李调元：《童山文集》卷三《〈函海〉后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 1 456 册，第 510 页。

本经句度,抄写注出,子细看读,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,各部随帙刻印板,广颁天下。”^①五代《九经》包括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“三礼”、“三传”九部经书,前后刻了22年,经历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四个朝代,直到后周广顺三年(953年)才告竣工。五代刻印《九经》,开了雕版印刷儒家经典的先河,成为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,因此也有人将丛书的起源归之于这一时期,只是五代刻印的《九经》也未能流传下来。

南宋说

上面几种说法都是建立在丛书广义概念的基础上的,论述的都是专门类图书汇编之起源,而南宋说则是建立在丛书狭义概念的基础上的,它以清钱大昕为代表。钱在《跋〈百川学海〉》中说:“荟粹古人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,始于左禹锡《百川学海》。”^②《百川学海》刻于南宋咸淳九年(1273年),所收多唐宋人著述,兼及晋及六朝者,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,是一部典型的综合性丛书。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,《百川学海》被人们誉为“丛书之祖”,而这一说法至清代末年发生了动摇。清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书商从山西购得《儒学警悟》抄本6册,从书中题识可知《儒学警悟》最初刊行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(1201年),这就比《百川学海》成书提前了70多年。这部书后为江阴缪荃孙所得,经缪荃孙、傅增湘校勘,由陶湘于1922年刊印出版。缪荃孙在序言中说:“前人以左圭《百川学海》为丛书之祖,顾《学海》刻于咸淳癸酉,先七十余年已有《儒学警悟》一书。”^③至此,《儒学警悟》在丛书出版史上的地位得到确认。但不论是《百川学海》还是《儒学警悟》,都成书于南宋时期,因此我们统称上述两种说法为“南宋说”。

① 《五代会要》卷八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,第128页。

② 〔清〕钱大昕: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1439册,第42页。

③ 《儒学警悟·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》,中华书局2000年版。

类书说

还有一种观点,丛书由类书演变而来,如清法式善说:“考丛书古无刻者,宋温陵曾慥始集《类说》,自《穆天子传》以下共二百五十种,并录原文及撰人系历,是为丛书之祖。”^①清叶名澧也说:“宋温陵曾慥集《穆天子传》以下二百五十种为《类说》,是则后世丛书所由昉。”^②谢国桢先生赞同这一观点,他说:“余则恒以丛书之名盖由类书演变而成者也。类书中,宋有曾慥《类说》一书。其书流传甚罕,余曾见明抄本,汇辑古今著述约数十种,然皆删节不全,此已肇丛书之端。至元陶宗仪《说郛》,近人汇刻书目,始列入丛书,而《四库提要》则列入子部杂家杂纂之属,其书虽在宋左圭《百川学海》之后,而其体例,实可窥见丛书与类书演变之迹。”^③

上一节我们已谈到丛书与类书的区别。肯定类书在丛书产生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,是合乎实际的,但是,如果说类书中的《类说》就是丛书之祖,则未免牵强。因为,即便以《类说》与早期丛书《说郛》相比,也存在明显的差异,这主要表现在:《类说》“体例乃删削原文,而取其奇丽之语,各加标目于条首,与当时王宗哲所刊《绀珠集》相同”^④;而《说郛》则于书名之下直接收录原文,虽有删削,但并不改动原作。以两书共同收录的《西京杂记》为例,《类说》罗列“绋几”、“常满灯”、“七夕穿针”、“九枝灯”、“珠襦玉匣”、“菊酒”、“饮酎”等数十词目,为的是便于人们查检,而《说郛》在辑录原文时,并不开列条目。

作为早期产生的丛书,《说郛》对原书大量删削,还带有从类书脱

① [清]法式善:《陶庐杂录》卷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1177册,第654页。

② [清]叶名澧:《桥西杂记·丛书》,中华书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第2967册,第27页。

③ 谢国桢:《明清笔记谈丛·丛书刊刻源流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,第202页。

④ 《类说》书前四库提要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,第873册,第1页。

胎而来的痕迹,但这一现象,至丛书发展的后期,已很少见到。

清代的多数学者,从狭义概念出发来认识丛书,他们心目中的丛书,具备总聚、胥杂的特征,这一类型的丛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综合性丛书。综合性丛书产生于南宋时期,而远在综合性丛书产生之前,已有数量不少的专门类丛书问世。因此,谈论丛书的起源,并不能局限于丛书的狭义理解。

我国的典籍源远流长,丛书也不例外,关于它的起源,很难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做科学的界定,我们是否能作这样的归纳:先秦时的“六艺”(后称“六经”),已显现出丛书编纂的萌芽;东汉时的“熹平石经”,是第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专门类书籍的汇编;南北朝齐梁时的《地理书》和《地记》,是最早手工抄写的专门类丛书;五代的《九经》,开辟了雕版印刷专门类丛书的先河;而综合性丛书的鼻祖,当推南宋时俞鼎孙、俞经辑集的《儒学警悟》与左圭辑集的《百川学海》。

第三节 古籍丛书的种类

古籍丛书有哪些种类,诸家分法不一,目前影响最大的是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。《综录》将丛书分为汇编与类编两大类。汇编之下又分杂纂类、辑佚类、郡邑类、氏族类、独撰类五类;类编之下分经类、史类、子类、集类四类。

汪辟疆的《目录学研究》,则分丛书为总类与专类两大类型。总类之下分举要、搜异、景旧、辑佚四类;专类之下分专代、专地、专人、专学四类。

谢国桢的《丛书刊刻源流考》,分丛书为汇刻、类刻、辨伪辑佚、自著、郡邑、族姓六大类。

李致忠的《中国典籍史》,分丛书为综合丛书与专类丛书两大类。综合丛书之下又分汇编类、地方类、氏族类、独撰类四类;专门性丛书归入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